



规模世界第一，农业保险如何遮风挡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

洪水退去一周后，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五滴村村胡进喜还在树林里找牛。他有17头牛，每头牛交了100元的保费，最高保额1.5万元。如果牛因洪水死亡，他可以获得赔付。但过去的赔付惯例是，如果没有尸体，就无法核定损失。

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吉林省在内的很多地方，养殖户和农户都因洪水遭受损失。日益频发的气候灾害正威胁着全球农业发展。2022年，我国极端高温事件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多。今年8月，雷电、暴雨、雷雨大风、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数量达2017年以来最高值。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保险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21年为例，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340.2亿元，保险业因灾赔付186亿元。当年的河南暴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09.81亿元，保险业支付赔款97亿元，约能覆盖经济损失的10%。

其中，农业保险对恢复农户生产的作用愈发显著。《科技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2022)》显示，根据2007-2020年的财政资金杠杆率测算，每增加1元保费，能分别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21.8元、25.9元的风脸保障。

胡进喜的运气不错，最终的牛都还活着。由于今年情况特殊，同村没有找到牛的农户，最终也根据估算的肉牛重量获得赔款。但记者采访中发现，各地仍存在赔付标准不清晰、赔付金额偏低的理赔争议，而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的特点，也让保险公司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超赔”风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教授虞国柱认为，协调好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者的关系，是未来我国农业保险纵深发展的关键。

农业保险赔不到位？

说起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虞国柱提起一段经历：2000年他在湖南调研，看到一些农民在洪灾过去两年后仍没能恢复耕作，挤在帐篷里，靠政府每个月发的17斤大米生活。

20多年过去，虞国柱欣慰地看到，农业保险正成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的重要力量。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实施，标志着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制度正式确立。在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的补贴下，农户只用缴纳20%左右的保费，个体的风险在广大的参保农户中被分担。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毗邻鄱阳湖，1/3的田块易涝易旱，该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2021年起逐步推广完全成本保险（除基础的物化成本外，将土地和人工成本也纳入保险范围——记者注）后，易涝易旱的田块种植率明显上升。

但一些农户对理赔仍有疑虑。一名都昌县的种粮大户连续4年购买了保险，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去年8月都昌县遭遇大面积旱灾，按照保单，一亩水稻绝收应该赔付800元，但最终只赔了600元，“定损员告诉我全县大面积受灾，赔的太多，只能降一降”。他觉得理赔就像“做生意讨价还价”，“你要觉得太低了，不愿意签字，就给你加一点”。

今年5月，河南部分地区遭遇“烂场雨”，有农户反映，一亩小麦绝收的



8月14日，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外，来自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农业保险查勘人员及东胡林村村民，在查勘农田受灾情况。

赔偿标准是300元，但实际的赔付金额只有20元。还有村民反映，自己比同村其他村民受损严重，但赔偿相差不多。

还有农户反映，为了维系农户的投保积极性，有些保险公司没灾时会返还保费。一名黑龙江省五常市丰源村村民告诉记者，交保费就像存钱，“（一亩）交五块钱，秋天再返五块钱，不淹也给赔点”。虞国柱解释，出现上述现象有保险公司赔付不规范的原因，也代表了农户对农业保险赔付水平更高、覆盖范围更广的期待。

他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的保险产品均以户为“投保单位”，部分地块的损失需要放在全部投保面积中平均。农户认为部分地块受损严重，但是整体计算可能没有达到“减产20%”的赔付标准。

达到赔付标准后，保险金额要乘以减产比例和不同生长期对应的赔付比例，以江西省某公司的赔偿条例为例，水稻生长期赔付40%，分蘖期赔付50%，扬花灌浆期赔付80%，成熟期赔付100%。虞国柱认为，无论哪个阶段受损，作物产量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国内外并没有类似分期。但保险公司出于风险规避，仍会严格划分生长期，使农户对赔付的获得感不强。

另外，不同保险类型的承保范围也有所不同。河南“烂场雨”后，部分小麦发芽后影响售卖价格，这部分损失并不在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之中。现行的保险条款只保产量损失（成本）责任，小麦质量下降，**2017年2月，麻小波在学校签署的保证书**，有时会出现“倒签单”，或者拖欠、截留、挪用保费补贴的现象。

虞国柱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不仅破坏保险市场良性运作，还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堪忧，进而选择压赔、惜赔。

“精准理赔”难在哪里

事实上，保险公司也期待实现精准理赔，但现实中存在不少限制因素。

我国种植业散户多、规模小、分布分散，承保理赔中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有限，基层业务成本高。仅在收集农户自缴保费方面，某省保险监管机曾公开测算，如果派20人去一个村庄上门收保费，车费、工资等亩均承保成本为5.3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户每亩3.6元的自缴保费。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短时间内精准定损的压力也较大。再加上每年村里都会有改种、农民外出务工等情况，而且灾后基础设施尚未完全恢复，灾后统计难度大、耗时长。

中原财险鹤壁市服务组负责人回忆，

2021年河南“7·20”特大暴雨灾害后，他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曾1天查勘13家养殖户企业。在一些尚未退水的村庄，他们只能使用无人机辅助定损。目前技术对于定损的辅助作用有限，第三方遥感服务在定损中遥感的清晰度和精确度仍然不足。

另一方面，虞国柱在调研中发现，在村集体投保中会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散户多通过村集体统一投保，难免产生攀比心理。一些承保机构把一个村的受灾农户按受灾程度分为2-3个档，每档的若干户数都按一个损失程度进行赔付。还有地方的村委会把全村保险赔款加上少量救灾费用加在一起，平均分给村民。

“一碗水端平好做事”，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这样解释。按照江西省省农业保险管理文件，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承保、查勘、定损等技术支持。在遇到理赔纠纷时，该工作人员介绍，都昌县农业农村局会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定损，但最终往往会考虑维护村内关系稳定。

虞国柱在过去的调研中曾经发现，个别地方存在专门调动农户就农业保险理赔进行上访的“黄牛”，逼迫承保机构答应其不合理的赔付要求。一些承保机构为了在本地持续经营，只能被迫答应。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关系也影响着赔付效果。在部分财政紧张的县，有时会出现“倒签单”，或者拖欠、截留、挪用保费补贴的现象。

虞国柱建议，可以把查勘定损时期承保机构深入现场查勘定损的数量、抽样的数量、投入的查勘力量等列入绩效考核，把人为的主观评分变为系统即时评分，能够反映过工作的指标即时上传平台。

2017年，**麻小波回家看到弟弟躺在地上睡觉**。方政府行为也应被纳入监管范围。以保费补贴管理为例，2021年新修订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规定，对拖欠承保机构保费补贴较为严重的地区，财政部将通过适当方式公开通报，下达督办函进行督办。整改不力的，财政部将按规定收回中央财政补贴，取消该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但实际操作中，保费管理缺乏相对应的监管机构，相关文件中也无明确规定。银保监会、银保监分局负责辖区内保险机构和保险业的直接监管，但保费补贴涉及多级财政部门，银保监会、银保监分局难以监管。记者询问河南省、黑龙江省的某些市级银保监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负责保费补贴的管理，主要工作是灾后督促承保机构快速理赔、应赔尽赔。

一些省份积极探索解决应收保费问题，今年已经有11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实行“直拨”模式，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结算中央和省级的保费补贴资金，这样能有效避免保费补贴被地方政府拖欠、挪用。虞国柱估计，这种模式下应收保费率将降低至10%以下。

他建议，类似的“直拨”模式可以通



视觉中国供图

政府能否发挥“催化剂”作用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市场保费规模正稳步扩大，2020年保费规模达到815亿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2020年美国农业保险深度（单位面积保额/单位面积产值）达5.89%，是同时期我国农业保险深度的5.6倍。

《农业保险条例》中，农业保险的经营原则被定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

虞国柱指出，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虽然不直接参与交易，但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推动力”，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既要给投保方提供价格补贴，并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协助进行损失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还要动员和组织农户投保。

想要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已经建立起本省农业保险信息管理平台，山东、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江西、吉林等地正在探索建设中。

虞国柱建议，可以把查勘定损时期承保机构深入现场查勘定损的数量、抽样的数量、投入的查勘力量等列入绩效考核，把人为的主观评分变为系统即时评分，能够反映过工作的指标即时上传平台。

2017年，**麻小波回家看到弟弟躺在地上睡觉**。方政府行为也应被纳入监管范围。以保费补贴管理为例，2021年新修订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规定，对拖欠承保机构保费补贴较为严重的地区，财政部将通过适当方式公开通报，下达督办函进行督办。整改不力的，财政部将按规定收回中央财政补贴，取消该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但实际操作中，保费管理缺乏相对应的监管机构，相关文件中也无明确规定。银保监会、银保监分局负责辖区内保险机构和保险业的直接监管，但保费补贴涉及多级财政部门，银保监会、银保监分局难以监管。记者询问河南省、黑龙江省的某些市级银保监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负责保费补贴的管理，主要工作是灾后督促承保机构快速理赔、应赔尽赔。

一些省份积极探索解决应收保费问题，今年已经有11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实行“直拨”模式，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结算中央和省级的保费补贴资金，这样能有效避免保费补贴被地方政府拖欠、挪用。虞国柱估计，这种模式下应收保费率将降低至10%以下。

他建议，类似的“直拨”模式可以通

过修订《农业保险条例》确定下来。同时在修订时加入涉及财政补贴资金的处罚处分条例，规范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

回顾1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仍较依赖政府补贴。原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农业保险承保利润分别仅为1.01亿元和2.77亿元，承保利润率只有0.17%和0.4%。

进一步提高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也是政府未来的努力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翀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在一些地区，部分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简单赔付率连续几年都超过100%，高风险严重影响他们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面对愈发频繁的“超赔”风险，董翀发现，大型保险公司的机构网点布局相对成熟、综合成本较低，能通过区域间协调进行风险分散，而小公司承保区域往往较小或相对集中，且经营成本较高，有可能不得不选择暂时退出农业保险市场。

我国物产丰富、种植种类多，许多特色蔬菜、水果和水产没有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董翀认为，部分规模经营的养殖户其实对保障水平更高的商业保险也有需求。但目前市面上的保险产品较为单一，不能有效满足各类经营主体的多样化保险需求。

一位在海南种植热带水果的大户告诉董翀，根据他的经验，购买保险大约每3年出险一次，如果采取有效的防灾减损措施，受灾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内，而3年的商业性保险保费支出和购置防灾减损设施的支出大致相当，且理赔理赔麻烦，赔付金额有限，于是他选择把钱花在购置防灾减损设施上。

除了农户的风险意识有待提升，这也体现出保险产品的设计尚不能很好契合农户需求。“合理的产品设计需要基于多年的数据积累，而目前农业产业领域数据积累和应用水平都有待提升。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创新险种成本较高，审核批复流程复杂，导致保险公司创新商业性农险的积极性不足。

董翀建议，政府可通过开放市场准入、打破市场分割、加快推动农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税收优惠等支持农险保险的市场化运作，优化政策鼓励农业科技保险投入，建立有关农业灾情、土地确权等数据的共享机制，并加快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些国际经验或许可以参考。在以小农户为主、农户支付能力有限的非洲，为开发价格便宜、投保简便的农业保险产品，各国政府与农险科创公司及国际机构合作，有些创新产品将保险费用的支付推迟到收获后，降低农户购买保险的门槛。还有基于图像的新型产品，通过农户定期自行上传农作物生长情况图片，提高远程理赔精确度。（文中胡进喜为化名）

妈妈上班去

产假结束的第一天，我就立刻坐回到电脑前，渴望过去几个月为哺乳摄入的过剩营养迅速转化成工作的洪荒之力。

我做了全面复产复工的准备，调整孩子的作息与我工作的时间匹配，准备好奶瓶和温奶器，这样即便我一时抽不开身，他也可以吃到存在冰箱里的口粮。为了提高效率，我甚至主动给编辑提出了文稿“死线”。

但事实上，我低估了生育带来的影响。我很难长时间专注地托着脸袋写作，每3个半小时要吸一次奶；孩子会突然哭闹，我的时间和语言都被切得碎碎；睡眠不足，身体像一辆破车，预热很久才能发动，刚驶上快车道，孩子又哭了。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我能怪孩子吗？不能，他的笑是治愈我的良方。

“我要被淘汰了”，我在电话里大声对我妈讲，“我可不能马上就会收到职场‘给妈妈的罚单’！”

我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带薪留职”一词正兴起。我妈和王健林、潘石屹等人一样，都提交了“带薪留职”申请书，只不过人家是去创业，我妈回家看娃。她有几年全职在家，重返职场时，和她同批工作的同事都成了她的领导。我妈不想我走她的老路。

我花重金请了带孩子的保姆，家政市场上，她们是炙手可热的“育儿嫂”。我工作上稍松一口气，工资就不起育儿费用。

网友替我算过一笔账，在北京，没有老人帮忙照料孩子的双职工家庭，每个月支付给育儿嫂的费用约9000元，高于北京市2022年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水平8711.83元。按照孩子3岁入幼儿园计算，三年的育儿嫂支出超过30万元。这仅仅是养育孩子的九牛一毛。

在带娃这件事上，国内外女性面临的困境差不多。我查到的一份国外研究显示，在美国，生完小孩后，74%的职业女性会不顾一切重返职场，40%的女性会继续从事全职工作。离开职场一年，女性的年平均收入将下降20%，女性“驶离职场高速路”的平均时间是两到三年。产假时间越长，上班族妈妈和爸爸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我感慨，养一个孩子的难度是普通本科两个就是“双一流”高校，三个无异于考上清华北大。七个，就是欧盟主席了——我还在月子里，我文夫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和马克龙一起访华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女的，养育了7个孩子。”

“7个孩子”被写进新闻标题。这似乎是女性的“特权”，也是一个传统的性别角色陷阱。就像顺产妻子接受采访时，都要被问“如何兼顾工作与家庭？”

接手养娃这项需负责、辛苦且重要的系统工程后，我们不得不将手里的事项重新排列组合。为了适应生活里多出这么一个一刻不停的小生命这件事，我文夫冒着失去大客户的风险，努力把每周的应酬和出差精简到个位数，平均每天可以挤出半个小时亲子时间。

产后激素的剧烈波动和养娃的疲惫让我时常成为家庭战争的发起者，我在又一次独自深夜哄娃后崩溃大哭。大数据比我文夫还能共情我的情绪，经常在App首页为我推送“为什么产后第一年是离婚高发期”。

我刚出月子就在研究托育机构。有同事建议我搬到郊区去，她们考察过，那有家不错的托育园，只不过大人通勤单程要3个小时。另一个朋友在今年秋天换了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新单位为员工配备了托育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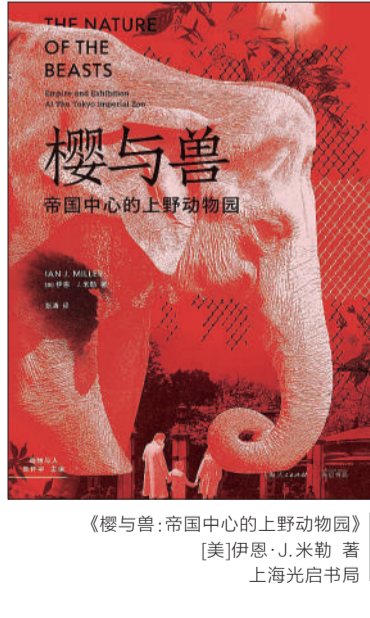
一群去托育园考察结束后的妈妈们心坎不已，但大多没能越过重重阻碍。有的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不具备决策权；有的担心送孩子到托育园，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妈妈”——社会对母亲有传统期待，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的表现。

社会科学发展两百年了，为什么这些期待还“裹着小腿”呢？诸多研究结果显示，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连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而父母的行为因素，以及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

2021年，浙江省教育厅印发全国首个关于教育幼托班管理的指南，随后又在17个县设立普惠托育首批试点。备孕的同事跃跃欲试，对幼托事业的发展极有信心。

我强打精神，尽管又在电脑前枯坐一天，但觉得起步慢一点没关系，在职场的高速路上，踩稳油门，要加速。

妈妈上班去



《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美]伊恩·J.米勒 著
上海光启书局

□ 郭玉洁

在现代社会的万物中，少有像动物园这样，明摆着自相矛盾的。“每一座动物园都不外乎既是个游乐园，又是座监狱。”《动物园曝光的秘密》一书中说。对动物来说，那里是安乐窝，亦是软禁场。

尤其在20世纪中叶以前，动物园可能是个恐怖之所。那些被认为“过剩”的、不受欢迎的动物会被合法地杀掉，剥制成标本，或运到兽医学院的解剖室。在一些地方，黑猩猩被训练做出

影音书画

咧嘴微笑表情，取悦游客。然而有科学家说，在黑猩猩的表情系统中，微笑其实表达的是恐惧。

如今，有要求规定，动物园中的动物应该有免受恐惧和悲伤、免受伤害和疾病的自由。人们用水流、壕沟、玻璃墙代替了铁链、铁丝网，但仍然有人会说，“如果可以的话，动物不会生活在动物园”。

美国学者伊恩·J.米勒在学术著作《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中展示了动物园更多的矛盾性。他用东京上野动物园的近代史，揭开一个微缩宇宙。在这个看似逍遥悠然的场地，在一个多世纪中，大象、马、熊等动物的命运几经沉浮，动物园里发生着战争，经历了暴力、谎言、残忍、无差。

大批外来动物，是随着日本殖民扩张的脚步涌进这家动物园的。刺猬是1939年从中国空运而来；韩国鹿1941年来到这里；1942年，一群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科莫多巨蜥出现在东京。这些动物被标注成“战利品”来展示。

骆驼和马有相反的命运。1894年，日本军队在旅顺港袭击中从中国军队抢来的三只野双峰骆驼被放在上野动物园展览。1902年，日本一本杂志不加掩饰地将骆驼和当时战败的中国联系起来，并说“骆驼无非是一种笨拙、安静、多少有些

动物园里观察人

愚蠢的动物而已”。那时动物园中地位最高的是日本退役军马，它们被作为“功臣”展出、接受膜拜。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些风光一时的马或被登记为苦力，或被吃掉了。1972年，中日建交，中国送来两只大熊猫，被称为“中国人民送给日本人民的礼物”，熊猫到来那天，无数记者在机场发出“真可爱啊”的感叹。这种可爱、无攻击性、在自然世界中被边缘化的珍稀动物，俘获了和平时期的人们。1973年，上野动物园的访问人数攀升到700万以上。1972年到2008年间，超13亿人在参观上野动物园时看过熊猫，有的看过不止一次。“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什么？还用问吗，毫无疑问是熊猫。”《读书新闻》一篇文章标题这样写道。

这样平和美好的画面，只有在翻过上野动物园历史上最血腥一页之后，才能显示出其意义。1943年，日本在战争中颓势已现，据称，为防止大型动物在轰炸中因惊恐变得“疯狂”，威胁城市安全，政客下令屠杀上野动物园的大型动物，饲养员们要在一个月之内，毒死、饿死、锤死、绞死、刺死自己精心照料的动物。“饲养员们在惊恐中目睹眼前的一切。很多人在强烈的厌恶中背转过身去……”

1943年9月4日，东京上野动物园举

行一场动物慰灵祭祀仪式。数百名政府官员以及围观群众，跟随在行政长官、佛教僧人后面，蜿蜒行进在四处是空空笼舍的寂静的路上。这是荒诞和自相矛盾的一幕，仪式把这些动物的死亡称为为国“殉难”。

在一张东京动物园协会提供的历史照片上，仪式现场挂着一块宽大的条纹布。伊恩·J.米勒在史料中发现了更令人惊讶的秘密：在这一背景布后，两头颇受日本民众喜爱的“明星”大象正顺顺地听从饲养员的话而“保持安静”。这对大象始终拒绝吃被下毒的食物。因为某种怜悯之心和侥幸心理，仪式开始10天前，饲养员才对这对大象执行严格的禁食命令，仪式当天，大象还没来得及按照计划被“饿死”，奄奄一息。这块平静的背景布前，成百上千的围观者对此一无所知。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双手合十在祷告，几名新闻记者在准备笔疾书。

大象的命运似乎是一个隐喻。战后的1946年，整个日本只有两头大象还活着。日本战后文艺作品《可怜的马》于1970-1998年间热卖100多万册。1949年，日本民众发出呼声，要求上野动物园重新引入大象。一位愤世嫉俗的饲养员说，“即使对一些像我这样不再信任人类的人来说，我也能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这些动物身上。”